

【英】J.F.C.富勒——著

胡毅秉 译

THE SECOND WORLD WAR

A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HISTORY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战略与战术

J.F.C. FULLER

台海出版社

【英】J.F.C.富勒——

著

胡毅秉——

译

THE SECOND WORLD WAR

A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HISTORY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战略与战术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略与战术 / (英) J. F. C.
富勒著；胡毅秉译.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168-1749-0

I. ①第… II. ①J… ②胡…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0073 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战略与战术

著 者：【英】J.F.C. 富勒

译 者：胡毅秉

责任编辑：俞滢荣

策划制作：指文文化

视觉设计：王 星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 - 64041652 (发行，邮购)

传 真：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430 千

印 张：27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5168-1749-0

定 价：9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失去智慧指引的武力必将自取灭亡。善纳良言的强权就连诸神也会眷顾。不过本质上对诸神缺乏敬畏之心的力量也会被他们憎恶。

——贺拉斯^①

^① 译者注：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诗人、批评家。著有《讽刺诗集》《长短句集》《歌集》《世纪之歌》《书札》等。

目录

前言.....001

第一章

战争的背景..... 005

第二章

德国掌握主动权的阶段，初期的成功与失败..... 037

第三章

德国改换作战路线..... 081

第四章

日本掌握主动权的阶段，初期的成功与失败..... 121

第五章

德国丧失主动权..... 149

第六章

日本丧失主动权..... 185

第七章

同盟国在西线确立主动权·····	217
------------------	-----

第八章

两条战线上的主动权·····	259
----------------	-----

第九章

同盟国在欧洲掌握主动权的结果·····	323
---------------------	-----

第十章

同盟国在太平洋掌握主动权的结果·····	369
----------------------	-----

第十一章

战争的突出要素·····	407
--------------	-----

附录

照明攻击·····	423
-----------	-----

前言

我并不打算为最近的这场战争撰写一部正史，因为我不相信在可掌握的资料还很有限的情况下做这样的事是切合实际的。但是我可以确信，如果只论及这场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我还是能做到让读者开卷有益的。不仅如此，我还相信，除非这场战争的历次战役对军人和门外汉——这年头大多数门外汉都是现役或潜在的军人——有着超出历史价值的意义，否则现在就是研究其成败得失的时候，因为在当今这个技术时代，战略原则和战术条令的应用变化之快使得过去的经验已经是明日黄花。因此，我并未尝试从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这几个方面研究这场战争，尽管它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对下列作战我也不做任何详细的探讨：大西洋海战，地中海的海军作战，苏联和德占国家的游击战，以及日本侵华作战。我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因为如果要正确评述欧洲战场的陆上战役，需要花费太多笔墨来介绍它们的背景；其次是因为在本书的既定篇幅内对历次军事行动进行全方位表述太过于庞杂；至于第三个原因，很多背景信息仍然晦暗不明，而且在我看来，它们与政治的关系要比与军事行动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苏联的战事除外）；最后一个原因是，要想使叙事具有条理且完整，就必须从头细说，更何况，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讲，这场战争都算不上十分精彩。

以上介绍了本书的整体情况。接下来，谈谈我的资料来源。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 官方文件和报告；(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传记；(3) 战地记者的报道和记录；(4) 有关纽伦堡审判的报告以及对敌方军人及其他人员的采访，

例如在舒尔曼少校（Major Shulman）的《Defeat in the West》一书中可以找到此类资料。第一类虽然大体符合事实，但少有关键意义。它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骨架，只带着零星的血肉；但是它们仍然有很大价值，因为如实记录了军事行动的梗概。第二类虽然往往带有个人偏见，却是四类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不过也只有将相当数量的此类资料汇总起来，才能通过互相验证来还原真相。然而截至目前，已经出版的此类资料实在太少，我只能依靠第三类资料来填补空缺；不过，无论如何第三类是一定要参考的，因为战地记者在亲临战场记录战况方面的才能是非常卓越的。但是我对他们关于苏联战场的报道并没有多少兴趣，因为他们被禁止亲临前线，只能被动地接受官方的宣传材料，无法亲眼看见，甚至无法亲自打听。苏联关于历次大小战役的官方叙述——他们的所有叙述都是官方的——实在缺少有用的信息，而且洋溢着太多的英雄主义情怀。虽然任何熟悉苏联军事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苏联军人的顽强和刚毅，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诸如威猛的库班或捷列克哥萨克“用马刀砍翻上万德国兵”之类的空话，也难免会令人生厌。同样，反反复复地阅读“数以万计的敌人被击毙，数以百计的居民点被占领”的文字，也同样枯燥乏味。或许是我运气不佳，但是至今我只看到一部能够明晰地描述苏联战事的著作，那就是企鹅丛书中的《苏联战役，1941—1943》和《苏联战役，1944—1945》这两卷，作者是W.E.D. 艾伦（W. E. D. Allen）和保罗·穆拉托夫（Paul Muratoff）。我从这两卷书中获取了大量信息，因此我在这里表示由衷的感谢。至于说到第四类资料——审判报告和讯问记录——虽然它们非常有吸引力，但我认为在目前应该谨慎采信。我的理由如下：（1）虽然我们可以确信在纽伦堡庭审中出示的文件是真实的，但没有证据表明所有文件都有被执行过；因为每个军人都知道，计划和方案总是会不断地修正；（2）战败者的证言也是令人质疑的，因为掩盖或淡化自身的过失并推诿于他人正是人类的天性。希特勒确实要为许多荒谬的行为负责，但是最荒谬的事显然是把所有罪过都归结于他一人；因为通常在战争中，许多力量的共同作用才能造成巨大的灾难或胜利。

现在来批评这些事实清晰的战役是很容易的，但无论如何，事后批评总好过永远不批评。倘若历史学家和其他相关人士自1919年能够拥有更多的批判

精神，那么我们在1939年也不会如此手足无措。此外，为了让本书中的批评显得不那么尖刻，我希望有心的读者翻看一下我在战争期间所写的文字——其中有些已经结集成书——这样一来你们就会发现，大部分批评都是在有关事件发生之前、进展期间以及事后不久做出的。因此，以下观点是我一贯坚持的：战争无非是一场致命的争斗，为了让战斗有意义，必须确定一个明智而且有益的政治目标。战争的目的并不是杀戮和破坏，而是迫使破坏者改变初衷。丘吉尔首相一手开创的“战略轰炸”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军事上也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更是毁灭性的——任何人只要去今天的中欧看一看，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关于意识形态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思想不会被子弹影响，更是因为动机越神圣，结果就越邪恶，从古到今莫不如此。被太多将领视作法宝的毁灭式轰炸不但非常笨拙，而且通常徒劳无功。用兵之道讲究的是胆识和策略，而不是仅靠武器和人数优势取胜。例如，英国的战略应该立足于海权而非陆权，就算只考虑不列颠岛的地理位置也必须这么做。对英国来说，尝试发挥大陆强国的作用犹如空中楼阁，而这正是她自1914年以来乐此不疲的行为。总而言之，无论敌人做过什么，像绅士一样作战要比像无赖一样作战更有利；因为无赖的战争只能以无赖的和平收场，而无赖的和平只不过是又一场战争，这在我看来真的没有必要。

还有一点是我不能不提的——人数和伤亡问题。说到前者，对交战各方来说，压低自身兵力和夸大敌方兵力都是家常便饭，因为这可以让胜利显得更加辉煌，失败显得情有可原。因此，我不能保证本书中给出的所有兵力数字都是准确的。至于伤亡，几乎所有官方数字都一律经过“修饰”。据记载，在1940年8月，德军连续两天发表公报，声称他们先后击落了143架和65架英国飞机，自身损失了32架和15架。而同样在这两天，英国人的公报内容是他们击落了169架和71架德国飞机，自损34架和18架。显然双方都对真实的数据进行了“加工”，而下表中的数字足以印证这个结论：

日期	皇家空军公报战果	德军承认损失	德军实际损失
8月15日	183	32	76
8月18日	155	36	71
8月31日	94	32	39
9月2日	66	23	34
9月7日	100	26	40
9月15日	185	43	56
9月27日	153	38	55
	936	230	371

陆战中的伤亡数字也同样让人一头雾水，而且常常匪夷所思。所幸我们可以根据一条规律来推测大概的数字，根据 1914—1920 年的《英国陆军统计摘要》，在 1914—1918 年的战争中，伤亡比例如下：阵亡和其他死亡占 19.94%，负伤占 66.29%，失踪和被俘占 13.77%，粗略算来，每死亡 1 人就有 3.3 人负伤和 0.7 人失踪或被俘——进一步简化后得到的经验法则就是 1 : 3 : 1。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资料显示有 1 万人阵亡，那么总伤亡数字应该是 5 万人左右。此外，鉴于通常在一场短促的战役中，20% 的战斗人员损失已经是上限，那么蒙受以上损失的战斗部队总人数就是 25 万左右。进一步推算，由于当今的军队中非战斗人员与战斗人员的比例是 2 : 1，上述军队的总兵力就应该是 75 万人左右。我曾看到一份有可靠依据的报告记载：在一场短促的战役中，有 20 万德军在苏联战线上一块相对狭小的地段被击毙。如果属实，按照以上方法估算，参战的德军必定有 1500 万人左右，这相当于德军在苏联总兵力的 3 倍。

战争或许是一门科学，或者是一门艺术，但是关于战争的报告基本上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把戏。因此，和所有关于最近这场战争的书籍一样，本书中必定也存有大量的错误。不过它着重于讨论战略和战术，那么我希望比起那些描绘纯英雄主义的史书来，它的错误能少一点。

J. F. C. 富勒
1947 年 9 月 1 日

第一章 战争的背景

战争的直接起因

根据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①在《和平谈判 1919》中的记载，1919年6月28日星期六，“La journée de Versailles（《凡尔赛和约》签订的那一天），我们到场时克列孟梭（Clemenceau）已经在华美的穹顶下就座了。他的头顶上就是那幅名画《Le roi gouverne par lui-même》（王者执政）^②。他看上去瘦小枯干，面色蜡黄，像是故事里干瘪的小矮人……寒光一闪，门口的共和国卫队士兵收剑入鞘，发出响亮的金属碰击声。‘Faîtes entrer les Allemands（带德军进来）。’克列孟梭道。他们被引导到各自的座位上，克列孟梭立刻打破了沉默。‘Messieurs（先生们），’他尖声喊道，‘la séance est ouverte（会议开始）。’接着他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最后不知是谁大声说了一句‘我们是来签订和平条约的。’于是圣康坦（St. Quentin）^③走向德军，带着无比的威严把他们引到堆放着条约的小桌前。德军签了字。

“突然间外面传来雷鸣般的礼炮轰响。这是在向全巴黎宣告：穆勒博士（Dr. Muller）和贝尔博士（Dr. Bell）在第二次《凡尔赛和约》^④上签了字。‘La séance est levée（会议结束）。’克列孟梭高喊。除此之外再无一语。

“我们留在座位上，看着德军像被告席上的犯人一样被带走，他们的眼睛仍然死死盯着远方地平线上的某处。

① 译者注：哈罗德·尼科尔森（1886—1968年），英国外交家，巴黎和会时英国代表团成员。

② 译者注：17世纪法国宫廷画师勒布伦为凡尔赛宫镜厅所作的天顶画，描绘了路易十四在罗马众神指引下执政的情景。

③ 译者注：罗马帝国时期在高卢殉教的基督教圣徒，自中世纪以来在法国被广泛尊为守护圣徒。

④ 译者注：历史上曾有多条约在凡尔赛签订，此处所指的第一次和约是普法战争结束后两国在凡尔赛签订的。

“我们继续留在座位上，等着五巨头通过走道离开。威尔逊（Wilson）、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自治领代表，还有另一些人；最后是克列孟梭，迈着他那一摇一摆，带有嘲讽意味的步伐。和我仅隔着一个座位的潘勒韦（Painlevé）站起身来向他打招呼，伸出双手握住了他戴着手套的右手，并向他道贺。‘Oui（是啊），’克列孟梭说，‘c’est une belle journée（今天是个美妙的日子）。’他迷蒙的眼中噙着泪花。

“玛丽·缪拉（Marie Murat）就坐在我身边，听到了这段对话。‘En êtes-vous sûre（你肯定吗）？’我问她。‘Pas du tout（一点也不），’她答道，真是个聪明的女人。”^①

就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礼炮声中被埋葬，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酝酿，虽然后一场战争——也包括前一场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蒸汽机、会计室乃至原始人的本能，但后一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就是《凡尔赛和约》。不是因为这个条约过于苛刻，也不是因为它缺乏智慧，而是因为它违反了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中的条款。请务必牢记这一点，因为正是这个不光彩的行为使希特勒得以动员整个德国作为他的后盾，并站在德军的立场上为他每次破坏这一条约的行动找到正当理由。

简而言之，事情是这样的：1918年10月5日，德国政府向威尔逊总统递交照会，表示接受他的“十四点原则”并请求和平谈判。3天后，威尔逊总统做出答复，询问是否可以认为德国政府参与谈判的目的仅仅是就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四大准则”和“五点细则”中所列条款的实施细节达成一致。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经过一番沟通，威尔逊总统于11月5日向德国政府做出了他的最终答复，表示盟国政府“已宣布愿意根据总统在1918年1月8日在国会演说中所列举的和平条款（十四点原则）和在他的后续演说中所阐明的和解原则与德国政府议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日后的凯恩斯勋爵）曾

^① 注释：《和平谈判1919》（Peacemaking 1919，哈罗德·尼科尔森著，1933年），第365—370页。

写道：“德国和盟国之间因为这次换文而达成的契约条理清晰，严谨规范。和平协议的条款应该符合威尔逊总统的历次演说提出的观点，而和平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它们的实施细节’。这个契约的细节具有非同寻常的严肃性和约束性；因为它的条件之一就是德国应该同意将会剥夺其反抗能力的停战协议。既然德国已经依照这个契约解除了自身的武装，那么盟国要维护信誉，就尤其应该尽到自身的履约义务，而且，盟国也不能利用自身的地位来谋取利益”^①。

然而盟国并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相反，在德国解除武装之后，盟国首先就抛弃了在先前多次召开的和平会议——包括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会——上与德方全权代表口头谈判时所遵循的程序；其次，在巴黎和会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德国的封锁；第三，他们废弃了停战协定的条款。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所指出的：“在威尔逊总统提出的23项条件中，只有4项被纳入了《和约》中。”^②

关于第一点，《和约》签订时担任意大利首相的尼蒂（Signor Nitti）在他的《没有和平的欧洲》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这将作为现代史上的一个恶劣先例而被永远载入史册：盟国践踏了一切誓言、一切先例和一切传统，甚至从未给德国代表发言的机会；在饿殍遍野、国力枯竭、革命爆发的威胁浮现之时，德国代表除了在条约上签字之外别无选择……教会的古老法则规定，必须给每个人一次陈情的机会，即使魔鬼也不例外。Etiam diabolus auditur（即便是魔鬼也有权发表意见）。然而新时代的民主政权虽然许诺建立国民社会，却连在黑暗的中世纪被视为神圣戒律的被告权利都不愿尊重。”^③

关于第二点，我们应该回忆一下温斯顿·丘吉尔首相1919年3月3日在议会下院的发言——他是这样说的：

①注释：《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1919年），第55页。

②注释：《和平谈判1919》，第44页。

③注释：《没有和平的欧洲》（Peaceless Europe，弗朗切斯科·尼蒂著，1922年），第114页。“这一不智之举对条约公正性的伤害或许超过了签字前的那则最后通牒。”【《二十年的危机1919—1939年》（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1940年】，第240页。

“我们正在全面实行或者随时准备运用各种高压手段；我们正在积极实施封锁，我们强大的军队随时待命，一旦接到通知就会在最短时间内进攻；德国现在已经濒临饿毙。我从陆军部的军官那里得到的证据表明：第一，德国全境都出现了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的迹象，德国军民正苦不堪言；第二，在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重压下，德国的整个社会和国民生活结构面临崩塌的巨大危险。因此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时候。”^①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逼迫德国在枪口下签约正是盟国的意图。

凯恩斯写道，和会一召开，“诡诈阴险的歪理邪说之网就开始编织，最终使整个条约的文本和实质都透着虚伪。全巴黎的女巫都得到了这样的指示：

正即邪来邪即正，

毒雾茫茫妖云腾。^②

最狡诈的诡辩家和最虚伪的法条起草人着手工作，炮制出众多高明的论调，可能足以将一个比总统聪明的人愚弄一小时以上。”^③

他还写道：

“他们不为欧洲的未来生活而忧心，也不为欧洲的谋生之道而焦虑。他们一心挂念的是边疆和国籍，是实力的平衡，是帝国的扩张，是削弱一个强大而危险的敌手的未来，是复仇，也是战胜国将自身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转嫁于战败国。

“两个关于未来世界政策的针锋相对的方案被摆上了桌面——其一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其二是克列孟梭的迦太基式和平方案。然而这两者中只有一个有资格进入议程，因为敌人并不是无条件投降的，而是按照关于和平总体性质的协议条款放下武器的。”^④

① 注释：《英国议会会议事录》（Hansard），第113卷，下院讨论第5辑，第84栏。在希特勒1939年9月1日对国会的演讲中，可以找到以下文字：“他们用枪指着我们的脑袋，用饿死数百万人民的威胁逼着我们签了字。然后他们又宣布这份靠武力签订的文件是神圣的律法。”（CMD《名人录》，6106,1939年第162页）

② 译者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一幕第一场中三女巫的台词。

③ 注释：《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第47页。哈罗德·尼科尔森也写道：“我预感后人在评判这次和会时，最重视的还不是它犯下的错误，而是它那令人震惊的虚伪性。”（《和平谈判1919》，第122页。）

④ 注释：《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1页。

冲突的种子就此埋下，它注定要开花结果，造成一场比这个背信弃义的条约所终结的冲突更为可怕的大战。

其中有一个人——虽说他代表着谈判的一方——预见到了未来的灾难。1919年3月25日，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上发表了一份题为“在条文起草工作完成前提醒和平会议考虑的一些事项”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写道：

“……你们可以剥夺德国的殖民地，将她的陆军削减为一支纯粹的警察部队，海军裁减为五流国家的水平；但到头来都是一样的，如果她感到自己在1919年的和平会议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那么她总能找到办法对她的征服者进行报复……要想维持和平……前提是不留下会激怒德军、不断激发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实，通过正义或公平的手段获得赔偿……在胜利之时流露的不义和傲慢将永远不会被遗忘或宽恕。

“基于这些原因，我强烈反对将德军从德国的统治下转移到其他民族的统治下，除非此举有可能让德军受益。德意志民族毫无疑问已经证明自己是全世界最有朝气、最有能力的民族之一，如果让德国被一群小国所包围，其中许多国家的主体民族先前从未自主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是每个国家境内都生活着大批极力主张与母国再统一的德军，那么我实在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原因比这更能引发未来的战争。按照波兰代表团的提议，将210万德军置于一个宗教信仰迥异，而且在其自身历史中从未体现出稳定自治能力的民族统治之下，在我看来，这早晚一定会在欧洲东部引发一场新的战争……”^①

很遗憾，这番警告被置若罔闻。德国被迫为整场战争承担罪责，担负了全部战争开销的债务。她的经济资源遭到掠夺和毁灭，西普鲁士（West Prussia）的大片土地被割让给波兰以制造“波兰走廊”。

在此不必详述，只需提及一个事实便已足够：为了强迫德国拿出条约所要求的天价赔偿，同时也为了瓦解德国，法国在1923年1月11日占领了鲁尔（Ruhr）地区。此举导致德国财政崩溃，失业率急剧增加。

^① 注释：引自《没有和平的欧洲》，第92—93页。

在英国有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个违反条约的行为的意义。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直言此举“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下院议员查尔斯·罗伯茨（Charles Roberts）指出法国“正在实施不可挽回的举措，其终极结果只可能是引发未来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而我认为这样的战争将可能带来文明的覆灭……”；下院议员R. 伯克利上校（Captain R. Berkeley）认为“如果说有一种处于战争边缘的行为……那么法国政府派兵进入鲁尔区的行动就是这样的行为”。《自由主义者杂志》表示：“几年内再爆发一场战争的可能变得更加明确和肯定了……实施预防措施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事实上，现在可能已经为时太晚——德军心理上遭受的创伤可能已经深得足以持续到他们恢复报复能力之时。”

法国的第二个目的是从奥地利到下莱茵扶植一批独立天主教国家，从而肢解德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占领鲁尔区的同时，他们发起了密集的宣传攻势，鼓吹将莱茵兰分裂出来，并把巴伐利亚转变为臣属于法国的独立天主教君主制国家。到了1923年10月，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运动已经大见成效，以至于巴伐利亚的首相在法国授意下，决定在当年11月9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5周年纪念日宣布巴伐利亚独立。就在此时他应运而生——阿道夫·希特勒。

在大战期间，希特勒是巴伐利亚第16步兵团的一名下士。停战以后，他加入了一个极小的政治团体，这个只有6名成员的团体自称为“德国工人党”，而希特勒在成为它的首领之后很快就把它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强烈反对分裂并自认为代表“人民和祖国”的他在11月9日与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Ludendorff）一起率领大约3000名追随者在慕尼黑的统帅堂游行，结果遭到警察拦截射击，最终一哄而散。希特勒本人也遭到逮捕，被判在兰茨贝格要塞入狱服刑5年。但是他在那座监狱里只待了13个月，期间写下了《我的奋斗》的第一卷。由此可见，M. 福利克（M. Follick）在其书中写道，“新的德国”正是“法国自己造就的；它诞生于法国的专横、暴虐以及压迫。”是言之有理的。^①

^① 注释：《直面事实：面向普通人的政治调查》（Facing Facts: A Political Survey for the Average Man, 福利克著，1935年），第102页。

德国找到了一个领袖：这个人只要等来一个机会就能顺势而起，并且一呼百应。这个机会就是1929—1931年的经济大危机——各战胜国财政政策的产物。在1928年，国社党（纳粹党）在德国国会中只有区区12个席位，但是当时已经在酝酿的经济衰退再次创造了与1923年相似的条件，因此到了1930年9月，他们已经发展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3年后，通过巧妙利用失业问题和大众的疾苦，希特勒爬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在被拥立为德国元首之后，他就着手逐条否认《凡尔赛条约》，与条约炮制者否认停战协议的做法如出一辙。

1935年3月16日，宣布恢复征兵制；

1936年3月7日，出兵收复了莱茵兰；

1938年3月13日，吞并了奥地利；

同年10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1939年3月13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同年3月21日，他要求将但泽（Danzig）归还给德意志帝国，并且让德国获得穿越波兰走廊的通道。

就这样，在命运之轮转动之下，20年前的3月25日的预言终于应验，在那一天劳合·乔治预言，将200万德军置于波兰人统治之下“一定迟早会在欧洲东部引发一场新的战争”。

另一些人也预见到了这一点。在劳合·乔治提出预言的10年之后，福利克也曾指出：

“波兰走廊的罪行要比这样的罪行恶劣千倍：假如德国打赢了战争，然后纯粹出于削弱英国的目的，划出一条穿过现今的喀里多尼亚运河（Caledonian Canal）^①、宽约10英里的走廊赠给荷兰。这可以类比法国划出一条纵贯德国最富饶地区之一的走廊赠与波兰的行为。法国的盟友竟赞同了这样的犯罪行为，可以说是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反文明暴行……为了给波兰提供一个海港，盟国又针对德国犯下了另一桩罪行：将但泽从她怀中夺走并宣布为自由市。在

^① 译者注：连接苏格兰东西海岸的一条运河。